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岩画及墓葬壁画 / 岳邦湖等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3

(遥望星宿: 甘肃考古文化丛书)

ISBN 7-80587-609-6

I. 岩... II. 岳... III. ①岩画学-美术考古-甘肃省
②墓室壁画-美术考古-甘肃省 IV. K87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00450号

遥望星宿: 甘肃考古文化丛书

书 名 岩 画 及 墓 葬 壁 画

作 者 岳邦湖 田晓 杜思平 张军武 著

责任编辑 刘铁巍

装帧设计 刘惠星

出 版 敦煌文艺出版社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网 址 <http://www.dhwycbs.com>

发 行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730030 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5 插页 2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80587-606-1

定 价 58.5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20世纪甘肃的考古和古代文献的大发现，是人类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不容忽略的，其中，尤以敦煌“藏经洞”和甘肃简牍的发现最为学术界所推崇。实际上，甘肃考古发现的重大学术和文化价值是这两者不能全部涵盖的，岩画和墓葬壁画的发现，就不仅拓宽了中国美术史研究地域上的视野，而且使得甘肃古代文化和古代艺术的各阶段和连接它们的链条更加灿烂和完整。

古代岩画和墓葬壁画的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至少在：考古学、美术史、文化人类学三个领域中都是热门的课题。但是，实际上这些形象的古代艺术品，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对古代人类历史的如实记载。也正因为如此，读者们可以从认识和了解我们先人的生存和生活状况、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等多方面、多视角地去欣赏这本书，去认识和阅读岩画及墓葬壁画。

甘肃墓葬壁画的发现始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兰新铁路等一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的上马，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的古浪、酒泉等地就发现了汉代的壁画墓，从壁画的内容和题材上讲，与中原广大地区发现的两汉壁画墓基本上是相同的，“车骑出行”和道教故事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与秦汉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不同地区文化的趋同性这一历史实际是相符合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嘉峪关、酒泉附近发现的魏晋墓壁画和彩绘砖，无论从创作技法还是表现的内容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结合近年陕西、山西发现的北朝时期墓葬壁画，我们可以发现，嘉峪关、酒泉附近的魏晋墓壁画在反映的题材上融合了三个地域范畴内的特定文化和社会习俗：中国传统的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生活在草原地带（包括漠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文化，中亚和西亚地区民族的文化。以上这个特点，连同利用天然颜料浓重的色彩来创作的技法，可以说是开创性的。在此

前，墓葬壁画在内容和创作技法上的这些特点，其他的地区是未曾见到。魏晋墓葬壁画和彩绘砖，近年来在敦煌、高台等地也有发现，具体的内容题材有所变化，比如有关历史故事的题材，如“李广射虎”彩绘砖就首见于敦煌发现的魏晋墓葬中，而高台魏晋墓中的“大车”彩绘砖就丰富了反映当时生产生活的内容，但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上的连贯性还是一目了然的。甘肃墓葬壁画留给文物考古界和学术界的课题是很多的，比如，汉代木版画与墓葬壁画题材和创作技法的比较，从汉代开始一直到宋金时期甘肃墓葬壁画发展的基本轨迹，与同时期其他地区墓葬壁画的异同及其原因，与敦煌艺术及石窟艺术的关系等等。然而最为紧迫的是将有关的资料尽快地披露和归纳，以使更多学者给予关注。不同单位的作者们联手将自己手头的材料加以整理，汇集成这本册子，目的也正在于此，有待学术界和感兴趣的朋友们对这些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甘肃岩画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本书作者之一的岳邦湖先生自始至终参加了对甘肃岩画的普查工作，这个工作持续了约20年的时间。岳邦湖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的对甘肃岩画的研究文章，引起了旅游和探险界的高度关注。难能可贵的是，岳邦湖先生对甘肃文物考古事业赤诚的热爱，他能牵头撰写这本著作的精神是令人欣慰的。另几位作者也都长期在河西地区从事文物的保护和宣传工作，对包括岩画和壁画在内的祖国历史文化遗产都充满着深深的热爱。他们对所从事的工作、对本书写作所投入的热情和精力是值得尊重的。

本书分三大部分，甘肃岩画及墓葬壁画概述、甘肃岩画分布及文化内涵部分由岳邦湖撰写；酒泉出土的墓葬壁画和砖画部分由田晓撰写；嘉峪关新城魏晋彩绘砖及壁画墓部分由杜思平、张军武撰写。

李永平

2004年1月于兰州



总序



绪论



前言



一、甘肃岩画及墓葬壁画概述

(一) 甘肃岩画概述 / 003

(二) 汉魏时期河西的绘画和壁画墓 / 004

1. 木板画 / 004

2. 墓葬壁画 / 006

3. 绢帛画 / 012

(三) 隋唐时期的河西壁画墓葬 / 012

(四) 西夏及宋元时期河西绘画艺术 / 012



二、甘肃岩画的分布及文化内涵

(一) 祁连山岩画 / 016

1.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别盖乡大黑沟岩画 / 017

2.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石堡乡灰湾子、七个驴岩画，
盐池湾乡阿尔苏力太岩画 / 021

(二) 马鬃山岩画 / 022

1. 山德尔岩画 / 023

2. 霍勒扎德盖岩画 / 024

3. 格干乌苏（和尚井）岩画 / 025

4. 洛多呼都克岩画 / 026

(三) 黑山岩画 / 026

(四) 永昌县杨家大山、牛娃山岩画 / 030

1. 杨家大山岩画 / 030

2. 牛娃山岩画 / 031

(五) 白银市吴家川岩画 / 032

(六) 甘肃岩画的价值 / 033

1. 岩画学研究方面的价值 / 033

2. 历史学方面的研究价值 / 034

3. 环境学方面的价值 / 035

4. 文化学和旅游开发方面的价值 / 035

(七) 各地岩画一览表 / 036

1.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别盖乡大黑沟岩画 / 036

2.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盐池湾阿尔苏力太岩画 / 039

3.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石堡乡灰湾子岩画 / 039

4.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石堡乡七个驴沟岩画 / 040

5.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山德尔岩画 / 041

6. 马鬃山下霍勒扎德盖岩画 / 042

7. 马鬃山上霍勒扎德盖岩画 / 042

8. 马鬃山格干乌苏(和尚井)岩画 / 042

9. 嘉峪关黑山岩画 / 043

10. 黑山石关峡岩画 / 045

11. 黑山磨子沟岩画 / 045

12. 永昌杨家大山岩画 / 046

13. 白银市吴家川陈家沟岩画 / 046

☆☆☆

三、酒泉出土的墓葬壁画和砖画

(一) 汉代彩绘砖墓 / 048

(二) 魏晋彩绘砖画墓葬 / 050

1. 西沟7号墓 / 050

2. 西沟5号墓 / 050

- 3. 崔家南湾晋墓 / 052
- 4. 丁家闸5号壁画墓 / 052
- 5. 高闸沟砖厂晋代太守墓 / 057
- 6. 西沟4号墓 / 058
- (三) 魏晋墓的结构特点 / 060
- (四) 魏晋墓彩绘砖画的内容 / 063
 - 1. 有关政治军事的内容 / 064
 - 2. 有关农耕畜牧的内容 / 066
 - 3. 有关少数民族生活的内容 / 068
 - 4. 乐舞 / 068
 - 5. 饮食文化与酒文化 / 069
 - 6. 纺织与服饰 / 070
- (五) 魏晋墓绘画的艺术价值 / 071
- (六) 酒泉地区汉晋墓室画砖一览表 / 073
 - 1. 高闸沟晋墓画砖 / 073
 - 2. 西沟7号墓画砖 / 076
 - 3. 西沟5号晋墓画砖 / 080
 - 4. 西沟4号晋墓画砖 / 083
- (七) 酒泉发现的唐代墓葬 / 085
- (八) 唐代墓葬的修建特点 / 091
- (九) 唐代模印砖画墓、彩绘模印砖画墓及
砖画的内容、价值 / 093

☆☆☆☆

四、嘉峪关新城魏晋彩绘砖及壁画墓

- (一) 墓葬形制的特征 / 096
 - 1. 筑墓方法 / 096
 - 2. 墓道和门楼 / 097
 - 3. 墓室结构 / 097
 - 4. 葬具和棺柩画 / 100

■ 目录

004

●陈炳应

绪论

这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历经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从汪洋大海逐渐演变成山地型高原，屹立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蒙新高原的交会处。地理环境复杂而神秘，有黄土高原、冰川雪山、草原绿洲、戈壁沙漠……孕育中国文明的两大母亲河——黄河、长江，或支流纵横、贯通甘肃南北，或以支流滋润着甘肃的部分地区。

最近一万年来，气候也历经了多次巨变，复杂多样：既有亚热带温湿气候，温带湿润、半湿润气候，也有温带、暖温带干旱气候和高寒半干旱气候，宜牧宜农，既造就了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和多民族格局，也造就了人们强悍、开拓的精神风貌。

甘肃位于我国的地理中心，东与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陕西省相邻，与中原、江南、东北相通；西与多种族、多民族文化汇聚的新疆接壤，从而连通了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和非洲；南临青海、四川，可通西藏、云贵和南亚、东南亚；北连内蒙古、宁夏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而可与欧亚草原和大漠相通。总

之，它成为人们东来西往、南去北进的交通孔道，成为欧亚旧大陆交通、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为国内外各族人民的往来、交流提供了多方面的基础条件，也造就了自古以来多民族聚居的格局。

甘肃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神话传说——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传说他们本是兄妹，后来结为夫妇。他们在混沌初开或天崩地裂、火山爆发、洪水泛滥等自然巨变之后，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立四极以柱地，积芦灰以止淫水；抟土作人，化万物；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作庖厨；造文字、创历法、画八卦、制嫁娶、设官作乐，以通神明，类万物，治天下；还有钻木取火，尝百草，制九针，立占筮之法等等。其子孙又迁徙四方，繁衍于全国各地。总之，他们是龙的传人公认的共同祖先，是中国悠久、灿烂文明的源头之一。此后，周人先祖躬耕于陇东，秦人先祖牧马于陇南、天水，并分别发展成统一中国的周、秦帝国，为今天的大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汉初期，月氏人从甘肃河西走廊西迁中亚，建立了著名的贵霜王国，成为公元1世纪至3世纪中亚地区的强国，并创造了著名的犍陀罗佛像艺术，使佛教迅速向外界传播，成为今天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同时，乌孙人也从河西走廊西迁伊犁河流域，成为中亚强国之一。十六国时期，甘肃的少数民族——氏族苻氏、羌族姚氏先后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前秦、后秦政权，为民族融合、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甘肃的后凉、南凉、北凉、西秦、仇池、宕昌等政权，也是由甘肃的少数民族创建的，对各地的开发作出了贡献。至于各方面的杰出人才那就更多了，如飞将军李广、哲学家王符、书法家张芝、医学家皇甫谧、收复河西的张议潮、祖籍甘肃陇西的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大诗人李白……都在历史上负有盛名。

神奇的土地，孕育了神奇的人民，创造了神奇的文明。神话传说并不是凭空编造的，而多是自然、社会巨变和古人认识世界的折射，是古代文化的一种，对于我们研究远古世界弥足珍贵。不过，它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发生的事件、发明创造集中于一个人身上，例如上述伏羲、女娲的功绩可涵括距今约几百万年到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还有，因为古代没有文字或有文字而对经济文

化记载过于简略，使今人知之甚少，甚至众说纷纭，疑信参半。如何才能证实、充实呢？近代考古学的产生，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金钥匙。

近代考古学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传播于全世界，并逐步完善提高。它泛指对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一切遗物、遗迹的调查、发掘、研究；研究所获得的社会历史、科学知识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包括考古方法和技术。主要是以田野调查、发掘为主体，以地层学、类型学和以发现的遗物、遗迹为根据，来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变迁。这是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当然还需要多学科的配合）。

我国早在11世纪时就已诞生了收集、研究古代遗物的“金石学”。例如，宋代时甘肃陇西（今渭源县东南）发现了鱼化石，杜绾就进行了研究。他在《云林石谱》中说：“地名鱼龙，掘地取石，破而得之，亦多鱼形，与湘乡（在湖南省）所产不异。古之陂泽，鱼生其中，因山颓塞，岁久土凝为石，而致然软。”他说的很符合今天的科学。但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则迟至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不过，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成绩斐然，为世界所瞩目。

甘肃的考古工作开始早，成果显著，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例如：

1900年，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箎发现藏经洞（今第17窟）和5万多件珍贵古文献。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中国学者周炳南等先后在敦煌的汉塞烽燧中掘得汉简数百枚。可说是甘肃考古的先声。

1920年，法国神父桑志华等在甘肃庆阳县城北25公里的赵家岔和55公里的辛家沟（今都属华池县）的黄土底部砾石层中发现的旧石器，是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第一批旧石器，成为中国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考古的先声。

1923年至1924年，被北洋政府聘为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肃临洮等地进行地质考察时，发现了一批史前文化遗址，他根据非常有限的资料就匆忙把甘肃史前文化分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和沙井期，甚至提出中国文化西来

说的错误论点，但立即遭到尹达等先生的质疑和批驳。不过，安特生的发现和研究，却是甘肃、青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的肇始。

20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籍学者布林在肃北塔崩布拉克发现约1500万年前的“甘肃古猿”化石，轰动了当时的史前考古学界。20世纪40年代，甘肃科学教育馆（省博物馆的前身）的王永焱先生在武都县龙家沟附近发现约1000万年前的“武都森林古猿”和共生的哺乳动物群化石，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森林古猿化石之一，也是世界上森林古猿化石分布最靠北方的地点，对研究古猿类的演变、从猿到人的进程和我国古人类的起源有极高的价值。

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夏鼐、黄文弼、阎文儒等先生，对甘肃的考古工作都非常关注，并多次来甘肃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裴文中先生的足迹踏遍了甘肃的东、中、西部，发现了属于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天水西山坪遗址；调查了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沙井文化的遗址多处，并提出“沙井文化”的正式命名。夏鼐先生发掘了广河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临洮寺洼山遗址、武威吐谷浑王族墓，并发现了兰州青岗岔半山类型遗址等。他根据科学发掘资料，首次提出“马家窑文化”、“卡窑文化”（即“卡约文化”）、“寺洼文化”的命名；指出安特生“六期说”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错误，并根据寺洼文化遗址发现的火葬墓，结合古文献记载氏羌人的葬俗，得出寺洼文化为古代氏羌人文化的科学结论。夏鼐、阎文儒还在敦煌掘得汉简49枚。前辈们田野调查、发掘资料和经验的丰富积累以及他们精深的研究成果、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后来的甘肃考古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的考古工作更有长足的发展——中央和本省都注重培养文物考古人才，建立了省、地、县三级文物考古机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长年派驻工作人员在甘肃考古队工作，基本上年年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征集工作，发现了一大批非常珍贵的古遗址、遗迹和文物，使甘肃成为全国著名的文物大省。特别是在史前文化遗址、彩陶、长城、汉代简牍、石窟艺术、敦煌遗

书，以及国宝级、国家一级文物的数量及特色等方面更在全国占有明显的优势。与此同时，这些考古资料强烈地激发了甘肃省与国内外很多学科的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和研究热情，他们结合文献记载和历史学、社会学、民族民俗学、自然科学的材料和他省他国的资料，对甘肃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面按时代择要简介——

在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在泾川大岭上发现了旧石器早期（距今约20万年~30万年以前）甘肃先民生活的遗址和打制石器。在镇原姜家湾、寺沟口发现了旧石器中期的遗址和遗物。而旧石器晚期遗址、遗物则在甘肃东、中、西部都有发现，多达20多处。其中，泾川牛角沟发现的“平凉人”头盖骨化石，武山鸳鸯镇大沟、骨头沟发现的“武山人”头盖骨、肋骨化石，庄浪朱店乡长尾沟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环县刘家岔遗址发掘的数以千计的石器、石制品等，都尤为重要。经研究，上述甘肃旧石器文化源于我国华北地区同时代的文化，而古人类化石的体质特征又是早期蒙古人种类型，因而可以断定，甘肃先民是中国本土的土著居民，后来的新石器文化与此一脉相承。

甘肃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的成绩更为显著，主要表现为：

其一，调查和发掘了几千处遗址、几千座墓葬，有充分的证据推翻安特生的“六期说”和“中国文化西来说”，基本上确立了甘肃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即：大地湾一期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谢端琚先生最近出版的《甘青地区史前考古》一书提出：“师赵村一期文化”应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分出来，作为“大地湾一期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的一种单独文化），其时间跨度从距今约8 000多年一直到距今约2 000多年，绵延不断长达约6 000年！大量的资料证实，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出现的彩陶与西亚两河流域的彩陶是世界上最早的、同时创造的两种彩陶文化，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而且，甘肃的彩陶文化存在时间长达约5 000年，数量多，分布区域广，纹饰繁复、多样、精美，艺术成就高，学术价值高，堪称全国之冠！

其二，发现了甘肃先民许多杰出的发明创造，如约7 000年至约8 000年前种植的粟、油菜籽，发明的纺织技术、彩陶、文字雏形（彩绘、划刻符号）；约5 000年至6 000年前建造的大型宫殿建筑（总建筑面积420平方米）和水泥地面、地画、精美的彩陶、窑洞式建筑和陶鼓；约3 000年至4 000年前发明的青铜冶铸技术、青铜雕刻技术、青铜分铸镶嵌技术以及具纽铜镜、凸面镜、大型陶水管的制造和使用，大麻的种植，马的饲养与使用等等，都是全国首创或最早的发明之一！它们不仅可以复原当时甘肃各地不同人群、民族的社会、文化面貌，而且也充分显示了甘肃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对我国古文化、文明的杰出贡献。秦安大地湾遗址长达3 000年的历史积淀，为伏羲、女娲诞生于甘肃成纪之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其三，涌现出一批精深的研究成果，上述两个方面都是研究的结晶。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重要彩陶纹饰之一的蔷薇科与菊科花卉图案，可能是华夏民族“得名的由来”，庙底沟人是形成华夏民族的“核心”，华夏民族及其文化“无疑是土生土长的”。

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提出：从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的“地望”、“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具备的特有表征”来看，“显然应当是羌人”的文化。而“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就是发展得较早的一些羌人文化的先驱”。胡谦盈先生认为四坝文化也是古代羌人的文化。任乃强先生更认为，甘青地区所有的石器文化都是上古羌族的遗留。

林梅村先生在研究了甘肃、新疆若干史前文化之后得出结论：“正由于甘青地区汉藏语系羌人的崛起，才阻挡了印欧人大举东进。否则，中国文明将像印度河古文明或两河流域古文明一样，毁于印欧人的大规模入侵。”

他们都把甘肃的考古资料用于研究全国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并取得可喜的成果，再次显示了甘肃考古和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甘肃先秦时期考古成果显著，成绩斐然。

庆阳、平凉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父乙铜爵、父丁铜觚、父丁有盖铜角、父辛铜盥、父癸铜卣和“乍册吾”大玉戈等，工艺精

美，带有铭文、族徽，都是国家一级文物珍品，对探索陇东古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交流，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庆阳、平凉地区是周王朝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夏朝末年，周人先祖不窋就率领族人来到庆阳，与戎狄杂处，经过三代人努力，逐渐壮大。庆阳县城东三里的帽盖山有不窋坟。灵台白草坡、宁县宇村等地发现不少西周墓葬、车马坑和遗址，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如溪伯（或释为“鬲伯”）铜方鼎、濼伯铜提梁卣、穆公铜簋盖、中生父铜鬲、铜人头戟、耳形虎纹铜钺、带镂空兽纹鞘铜短剑、圆雕玉人等，仅一级文物就达30多件，对研究周代礼制、陇东方国、民族关系、科技水平等都极为珍贵。

特别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和圆顶山先秦国人贵族墓葬、车马坑的发现，以及刻有“秦公作”铭文的青铜鼎、簋、壶、编钟、胄辖、四轮无轅饰有鸟兽的微型车形器和金虎、多种纹饰金饰片、玉器、线雕狩猎纹骨片等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对于研究秦人失落的早期史、确定众说纷纭的秦人早期迁居地、认识秦人统一中国的条件、早期秦人与西方的交流，都是弥足珍贵的。

甘肃的秦汉考古更有许多重大发现——

其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万里长城，在甘肃境内长达4 000多公里（包括秦、汉、明三代），建筑技术、方法多样，有的至今保存基本完好，非常壮观。它是古代保卫边疆和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见证，是力量的象征，又是今天重要的旅游资源。

其二，甘肃境内发现的秦汉简牍多达5万多枚，加上晋、唐和西夏的简牍共约6万枚，在全国首屈一指，内容又非常丰富珍贵，多是史籍缺载的，对于研究秦汉时期甘肃和全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极为重要。例如，秦简《日书》是迄今发现的第一部秦文化典籍，《志怪故事》是我国最早的神怪故事。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发掘表明，它是我国汉魏时期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邮驿机构。出土的2万多枚简牍，既有诏令、律书、官吏活动、物价、生活、经济和驿站管理机构、人员、车马配备、工作任务、制度的记录，也有鬲宾、康居、大月氏、乌孙、大宛等几十个国家与汉朝使节往来和羌人与中央政府关系的记载，非常珍贵，故被评为“1991年全

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其三，其他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如有战国木板地图、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的汉代铜奔马及与其一起出土的铜车马俑群、多种多样的丝织品、汉代木雕、木板画、帛画、漆画、壁画，以及文房四宝和汉武帝太守功德碑等，都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铜奔马、仪礼简、医药简、“白马作”毛笔、木轺车、木六博等，更是国宝级的顶尖文物。

甘肃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考古的重要成果——

其一，丝绸之路繁荣的见证。考古发现表明，至迟从约4 000年前开始，甘肃与西方已有交往与交流。汉代张骞通西域正式开辟了丝绸之路以后，东西方官方开始全面接触和交流（因为甘肃地处官方交流的主干道上，有官方保护）。河西走廊的绿洲便于商旅和往来使节的生活。从汉末至唐以前，中原战乱频繁，“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十室九空”，一片凄凉景象，而甘肃的河西走廊则比较安定，成为中原人逃难之处，因而丝路贸易相当繁荣，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阆阆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丝路文化的丰厚积淀使甘肃再度成为全国瞩目之地。不仅如此，它也是全世界瞩目之地，正如著名的东西文化专家季羨林先生指出的那样：“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敦煌和新疆。”甘肃考古发现的大量的佛教艺术遗迹遗物、用国内外多种文字写成的敦煌遗书、大夏鎏金银盘、外国与西域的钱币、壁画、丝绸、唐三彩俑、西凉乐舞等，就是最好的证据。例如，靖远出土的一件鎏金银盘，盘面上饰满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酒神和奥林匹斯山的12位主神，配以西方常用的40多种动物及葡萄、卷草纹，盘底还刻有大夏国铭文“价值490金币”，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经研究是中亚地区大夏国（一说东罗马）铸造的。它怎么跑到甘肃来了？显然是丝绸之路贸易、交流的结果。

其二，佛教艺术的繁荣。甘肃迄今发现的石窟寺莫高窟、榆林窟、麦积山石窟，均堪称全国第一。另外，如炳灵寺石窟等也都蜚声中外。特别是敦煌莫高窟，现存北朝至元代的洞窟735个，彩塑

2 000多身，壁画4.5万多平方米，木构窟檐5座。这是把外来的欧亚文化艺术吸收、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中，并进行再创作的杰出的文化艺术，它以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内涵丰富、艺术精美，以及兼收并蓄的恢弘气度和独具的特色而成为罕见的世界文化艺术宝库。1900年在藏经洞（今编第17窟）又发现了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佛教经典、多文种的社会文书、绢画、刺绣、法器等文物5万多件，内容丰富而珍贵，被誉为“古代学术海洋”，成为各国学者竞相研究的抢手资料，使敦煌学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显学”。为此，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武威天梯山石窟虽然知者较少，但它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在石窟艺术向全省乃至全国传播、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著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誉为“凉州模式”，有人更称之为“中国石窟之父”。此外，甘肃还发现、收藏了很多佛塔、造像碑、各种质地的佛像、舍利棺等，艺术、学术价值都很高。特别是北凉高善穆石造像塔、隋唐时期的金银铜石玻璃舍利棺和一些写经、佛画、塑像等，都是国宝级文物。

其三，发现了甘肃画廊。从甘肃东部天水到河西走廊的西端，从甘南草原到靖远山区，发现了很多岩画、墓葬壁画、木板画、漆画和帛画，虽然它们的时代包括史前到元明，但以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为多，故在这里一并介绍。这些画连接起来，恰似一座精美的画廊。其内涵表现了社会、民族的概貌，艺术性又相当高，甚至有不少是可填补历史、艺术空白的佳作。例如嘉峪关黑山岩画中一幅由30多人组成的大型操练图，形象地表现了少数民族的军事组织、操练和服饰，也体现了他们强悍尚武的精神风貌。有多幅优美的舞蹈图，单人舞、多人舞都有，甚至有的很像芭蕾舞的舞姿，令人惊叹。武威五坝山汉墓壁画中有一幅山林狩猎画，出现了我国早期的皴擦法和山水画，其人物、山林的比例基本上合适，比后来魏晋时期有些绘画“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绘技强得多，极为珍贵罕见。酒泉下河清汉墓壁画及甘肃各地出土的战国和汉代的木板画、帛画、漆画，其精美程度都清楚地表明，汉代河西地区的绘画艺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是后来佛教艺术大发展的肥沃土壤。嘉峪关、酒泉、敦煌魏晋墓出土了大量彩绘砖画、模印画和砖雕。仅嘉

峪关6座墓就有620幅画（另2座墓无画），一砖一画。也有以整壁作的大型壁画，如酒泉丁家闸5号墓等。这些画内容丰富，表现了社会和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嘉峪关5号墓的驿传图，二牛拉铁齿耙耙地图和酒泉高闸沟的太守断案图等，是全国最早的或仅见的。众多的采桑图、丝束、绢帛和农耕、畜牧、狩猎、宴饮、庖厨、乐舞图，应是当时甘肃盛产蚕桑丝织和社会安定富足的有力见证。画中人物不同的面相、服饰和帐篷等，表现了多民族聚居并和睦相处的历史事实（包括深目高鼻的西方人）。屯营图和屯垦图则表现了耕战兼备的边塞军屯生活。艺术上，构图丰满，主次分明，善以高度概括的精练笔画表现复杂的事物；重视刻画人物精神世界，形神兼备；多以线描为主，以设色为辅，线条流畅遒劲，色彩热烈绚丽，使整个画面充满生活气息，美不胜收，在我国的魏晋绘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酒泉果园西沟三座唐墓出土一大批模印砖和模印彩绘砖，有骑士、卫士、力士、乐伎、动物、花卉，有高浮雕和浅浮雕，有彩绘和素色，把魏晋时期的彩绘砖、模印砖、雕砖艺术融为一体，刻画自然，细腻，很有唐代气息。

其四，少数民族文化的考古收获。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古藏文文书，石窟中的吐蕃壁画，甘南地区发现的吐蕃墓葬等，对研究吐蕃—藏族的历史文化弥足珍贵，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武威青嘴喇嘛湾吐谷浑王族墓地的发掘，获得青海国王慕容忠墓志、大周故西平公主（即弘化公主）墓志等9方墓志，对于研究吐谷浑的历史变迁和武威史地颇为重要。同时出土的彩绘木俑、木器、漆器、瓷器、铜器、丝织品、象牙棋子、阮咸琵琶、牛角梳等，多是唐代宫廷用物或代表唐朝工艺水平的文物，颇为珍贵。天水出土的雕刻精细的石棺床，肃南大长岭出土的独具特色的金银铜器，也相当罕见珍贵。

甘肃宋元时期考古的重要收获——

其一，对少数民族党项羌人政权——西夏——的石窟寺、墓葬、遗址、窖藏的清理发掘、调查征集，发现了大量的瓷器、木板画、木器、金银器、丝织品、石刻、西夏文和汉藏文佛经、文书。其中，西夏碑、泥字版西夏文佛经、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经、雕版印刷的西夏文佛经、西夏文写本医方、银锭、唐僧取经壁画、冶炼图、酿酒图、西夏男女供养人画像等，多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珍品，